

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

柳宗元

康震 著

中華書局



第一讲

一步登天还是一步登空？

我来给大家背一首诗，一首很简单的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首诗大家太熟悉了，很多小学生都能够背得出来！不错，它是柳宗元的一首五言绝句《江雪》。

这首诗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非常清静，非常高远，非常清高的一种气质！自然界万籁俱寂，没有一点声音，只有一叶小舟在江水上静悄悄地停泊着，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老人，披着蓑衣，在江上独钓。

那么这是一首什么诗呀？有人说，是一首山水诗。似乎不错，诗中有山，还是千山，不是一座山，有小船，有渔夫，还有江水，这明摆着是一首山水诗嘛！

还有人说，这也可以是一首抒情诗。也对，作者抒发的就是一种悠然自得而又孤芳自赏的情趣！



总之，你看到的这江水，这孤舟，这群山，这披着蓑衣的老头儿，还有那冰清玉洁的雪，给人的就是一种清凉的感觉，一种大地真干净的感觉，颇有点儿不食人间烟火的意思。对！有人说，这是作者在表现自己冰清玉洁的人格。

这些欣赏都没有错。但是如果我要问你，柳宗元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诗来呢？你怎么回答？你说他就喜欢超凡脱俗，远离世俗的喧闹，想独自求个清静？你说他心里有事儿，心情不好，有点儿郁闷，躲开众人，在这儿静静地待会儿？你说他个性就这么孤僻，不爱跟人打交道？

其实都不是，这首诗的背后隐藏着一出巨大的悲剧，一段巨大的落差，一种绝望的心情。

这还要先从柳宗元青少年时代极度的辉煌说起。

柳宗元青少年时代的辉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有着辉煌的家族历史。柳宗元祖籍河东，也就是现在山西省运城市。他出身显贵，先祖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官员，到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与薛姓、裴姓并称“河东三著姓”，也就是河东地区最大的三个家族。从南北朝时期一直到隋唐之际，柳宗元的祖先们不是大将军，就是大都督，最不济的也是个刺史。在唐代初期，柳宗元有两个四世祖比较厉害，一个是唐高祖李渊的外孙女婿，算是个准驸马。另一个是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的舅舅。你看看人家这出身，想不骄傲都难！

第二，柳宗元少有大志，聪敏过人，才华卓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何以为证？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朝廷平定了叛乱的藩将李怀光，一位姓崔的高官要向朝廷表示祝贺，他特别邀请柳宗元代笔为他写这篇

祝贺的文字,这就是《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柳宗元不过十三岁。有人可能表示怀疑,然而看看王勃十七八岁便写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白居易十六七岁便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柳宗元十三四岁写这样一篇应景的文章应该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给朋友的信中,柳宗元曾说自己“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意思是说,我从小学习的目标是非常高的,瞄准的就是古代那些大有作为的人。韩愈曾对柳宗元的青少年时代有一段非常精辟的概括性评价: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柳子厚墓志铭》)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

柳宗元(字子厚)从小就精细敏捷,没有他不懂得道理,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当他的父亲还在世时,他虽然年轻,但是已经自立成人,他二十一岁就考中了进士,开始崭露头角。大家都说柳家有个好儿子。二十六岁通过博学宏词科考试,授集贤殿正字。他才智杰出,刚毅精悍,特别擅长发表议论,每次要发议论的时候,往往旁征博引,经史子集百家著作,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他的口才特别好,跟人家辩论,往往纵横捭阖,



意气风发，所向披靡，不把对方辩倒不算完，常常使满座的人为之叹服。柳宗元因此而声名大噪，京城中对他都都很仰慕，纷纷来与他交往，那些王公大人都争着想要将他收为自己的弟子门生，对他交口称赞并举荐他。

比起韩愈，柳宗元的科举考试顺利多了，但是他本人却不将科举考试放在眼里，觉得这玩意儿跟自己一生的伟大理想比起来根本算不得什么。在给一位高官的信中，他写道：

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

意思是说：

人跟人不一样。有些人喜欢舞文弄墨，有些人热衷于拓展地盘，有些人羡慕权势地位，有些人以实现政治理想、治理天下为乐。可是对我这样有政治理想的人来说，能够治理天下才是最大的喜悦。科举考试在我看来，反而是最没什么价值的事情，得到了我也不会觉得多么荣耀，失去了我也不会多么忧伤，即便因此而成名，对于我的远大理想而言，又有什么特别的助益呢？！

你看，考中的人就是牛吧？这话得考中的人说，考不中，像韩愈，就

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只能接连三次给宰相写信，发牢骚，埋怨东埋怨西，一副猴急的样子。

但是柳宗元的这些表现，起码让我们能感觉到，他不是个一般人，虽然年轻，但是非常有志气，有想法，有远大的目标。

柳宗元青年时代的辉煌还表现在第三点，那就是他的仕途特别顺畅，没有受过挫折，没有走过弯路。我们刚才说过了，柳宗元二十一岁就考中了进士，二十六岁通过了博学宏词科考试，这可比韩愈顺利多了。更重要的是，韩愈考中进士后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只好去方镇节度使那里曲线过渡一下，然后才开始一点一点朝上爬；而柳宗元一进入仕途就走得非常对路。何以见得呢？

我们来看看，柳宗元从二十六岁开始，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集贤殿书院正字，即皇家图书馆校对管理员，负责编校典籍、刊正文字，从九品上。这不仅为柳宗元进一步丰富学识奠定基础，也是唐代仕途惯例中最好的开端；三年以后，他二十九岁，担任京兆府（首都长安）蓝田县县尉，即蓝田县公安局长，正九品下。按照规定，如果没有这个阅历，将来就不能在皇帝身边做官，所以这一步对柳宗元非常重要。但是他实际又未去赴任，而是继续留在长安，协助京兆尹处理公文。这当然是由于京兆尹赏识他的文章才华，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但在客观上为柳宗元在长安打通人脉奠定了基础；两年后，三十一岁的柳宗元担任监察御史里行，相当于今国家监察部初级公务员，正八品上，负责监察百官。这个官职很重要，是由皇帝亲自任命的所谓“供奉官”，按规定，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与这一类供奉官才能经常得到皇帝的召见。一年多后，三十三岁的柳



宗元担任礼部员外郎，即相当于今文化部兼教育部高级公务员。这一下子就跳到了正六品上。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做了尚书省中的郎官，这就为将来进入核心决策层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我们来看，从二十六岁到三十三岁，短短七年的时间里，柳宗元就从一个布衣之士跳到了六品郎官的位置。他走过的这段路程是唐代读书人最理想最快捷的仕途之路。而韩愈从二十八岁最后一次应考博学宏词科失败算起，一直到三十九岁担任国子学博士这个所谓的五品官，则花了整整十几年时间。况且国子学博士虽然是五品，但是要权无权，要钱无钱，是个中看不中坐的冷板凳。

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柳宗元能够走得这么顺风顺水呢？

唐德宗统治时期，朝廷的弊端太多了。对待藩镇势力，采取的是姑息苟且的态度；而宦官则不仅干涉政治，更开始掌握禁军的统辖权；唐德宗刚愎自用，他所任用的宰相不是唯唯诺诺之徒，就是阳奉阴违、奸佞狡诈的家伙。因此朝廷上下都笼罩在一种万马齐喑的气氛中，很多像柳宗元一样的年轻有为之士，都纷纷要求改革，重振朝纲。

柳宗元在他考中进士的前后，结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与他同科的进士刘禹锡，也就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作者。刘禹锡不仅与他同科，而且在政治、文学、思想等很多方面与他志同道合。另一个是通过刘禹锡得以结识的王叔文。

王叔文是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因为善于下棋而被唐德宗召为翰林侍棋待诏，并侍奉太子李诵读书。柳宗元与刘禹锡考中进士的时候，王叔文在东宫已经快十年了，深得太子的恩宠。王叔文的家庭出身比较

低贱,但是他胸有大志,意欲革新朝政。他经常给太子说一些民间的疾苦,给太子出主意,对太子说某人可以做将军,某人可以做宰相,等以后您继承皇位之后便可以任用他们。劝太子“招纳时之英俊以自辅”。有一次,太子李诵跟身边的人商量着要给皇上的朝政提点意见,大家都很踊跃,只有王叔文默不作声,下来后,李诵就问他怎么不吭声呢?王叔文就说:当今皇上在位很久了,猜疑心很重,您作为太子关心关心他的健康就很好,还给他提什么朝政的意见呢?弄得不好,他会以为您在收买人心呢,您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李诵听罢,恍然大悟,流着眼泪说,幸亏是您提醒啊,不然我真是要吃大亏了!从此更加宠信王叔文。

在此期间,刘禹锡由于在东宫做官,就结识了王叔文,并将柳宗元介绍与王叔文认识。同时的还有十余位与柳宗元、刘禹锡一样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大都是进士出身,家庭出身并不高贵,但学有所成,目光敏锐,个性张扬,对唐德宗时期因循守旧、苟安无为、受制于宦官藩镇的政治局面颇为不满,想要改革朝政。这样,他们就都聚集在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小集团,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王叔文集团或者革新派吧。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病危。以王叔文为核心的革新集团计划拥立太子李诵即位。但是当时的李诵已患中风,说不出话来。这怎么办呢?危难之际,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团结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同情革新的宦官李忠言以及皇帝身边的昭容牛美人,再联合其他几位重要的大臣,挫败了反革新势力意欲另立皇帝的阴谋,成功地拥立李诵为皇帝,是为唐顺宗。唐顺宗即位之后,任命王叔文为翰



林学士、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相当于财政部部长，盐铁专卖特使），其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改革的总决策，并且紧紧抓住财政大权。王叔文是革新的首领。

改革派当时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

首先从皇宫的内政改起。停罢皇宫内侍郭忠正等十九人正员的俸禄；废除了专门为皇帝搜罗飞鹰走狗的“五坊小儿”；解散了宦官们挂名为内宫采办物品实则鱼肉百姓的“宫市”，也就是白居易所写的《卖炭翁》中的那种情形；还简放近千名后宫与教坊的宫女，让她们与家人团聚，选择自己的生活，等等。

其次，是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取消了一批苛捐杂税；取消了朝廷盐铁专卖所得利润要上缴一部分给内宫的规矩；取消了老百姓拖欠未交的各种苛捐杂税五十多万贯钱；将专卖盐铁价格从三百七十多文下调至二百五十文或三百文；罢免横征暴敛的京兆尹李实；大赦天下，下令招贤纳才；起用长期被贬或者不被重用的大臣；下达诏命，老百姓中凡九十岁以上的，朝廷赐给二石米、两匹绢，一百岁以上的，赐给五石米、两匹绢、一只羊、一壶酒，等等。

所有这些革新措施都富有成效，也深受广大士民的欢迎，这一点就连日后对革新派极尽毁谤之能事的韩愈也不得不反复承认革新措施使得“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韩愈《顺宗实录》）。但是，对整个改革的形势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这次革新举措是非常不彻底的，很多举措也是非常不适当的，这些都成为日后革新失败的隐患：

第一，当时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针对朝廷内部的积弊，虽然声势浩

大,但是没有触动藩镇的势力,同时在与藩镇发生矛盾的时候,也没有能够妥善地处理好关系,以致不仅没有削弱藩镇的势力,或者暂时稳住藩镇的观望立场,反而进一步激化了与藩镇的矛盾。

王叔文等人执政之后,剑南西川节度使兼太尉韦皋派遣剑南支度副使刘辟带着大量金钱游说拉拢王叔文。刘辟对王叔文讲:“太尉使辟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资治通鉴》卷二三六)意思是说,韦太尉让我向您致以敬意,他发话了:“倘若您把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这三川全部交给韦某管辖,韦某为您万死不辞,全力扶持您;但是倘若您不肯这么做,那么,我也会有报答您的方法。”后面这句话显然有要挟威胁的意思,不是报答而是报复。王叔文听了大怒,打算杀掉刘辟。刘辟听到风声,赶紧逃回剑南去了。其实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可不必如此激烈。这样一来,本来还持观望态度的韦皋等人,就立刻转变为王叔文等人的对立面。韦皋向唐顺宗上表,请求下诏令太子监国。又给太子李纯写信,认为:“圣上远法高宗,亮阴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心腹,遍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窃恐倾太宗盛业,危殿下家邦,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大意是说,当今皇上将朝廷大政交托给臣下,但是所交托的人选并不适当。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人徇私枉法,败坏朝纲,假公济私,贿赂朝臣,培植党羽,勾结宦官,如此一来,必然会危及社稷,祸及百姓。希望殿下早日奏明圣上,驱逐这些奸臣小人,收回权柄,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不久，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也都纷纷上表朝廷，意见与韦皋大体相同。这样一来，朝廷内外的官员们都将他们作为外援和靠山，越发不将王叔文集团放在眼中，这就对改革形成了更大的阻力。

第二，对于那些把持着京城禁军军权的大宦官，革新派本来是要剥夺他们兵权的。王叔文等任命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其行军司马。但是这一招很快被宦官识破：“宦者始寤兵柄为叔文等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属人。’希朝至奉天，诸将无至者。”（《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宦官们意识到这一步棋对他们而言是多么的致命，因此密令手下将领，不得接受范希朝的指挥，结果范希朝前往节度使驻地，将领们都不听命于他。对此，王叔文也只好说：“奈何！奈何！”显然，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王叔文集团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与听之任之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在处置类似事件中的软弱无力。

第三，唐顺宗的长子、广陵王李纯被立为太子，这个事件对革新派形成新的压力。由于唐顺宗久病不愈，难以亲自处理朝政大事，朝廷上下人心浮动，都希望能够早日册立太子，协助顺宗理政。可是王叔文等人为了能够集中权力，加速推进革新运动，并不希望马上册立太子，或者他们另有册立太子的计划。然而，当时坚决反对革新的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联合翰林学士郑杞等人直接面见顺宗，在纸上书写“立嫡以长”呈交顺宗，得到了顺宗的首肯。因此，李纯之所以能够被立为太子，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刘禹锡在回忆宪宗即位时曾说：“东宫即皇帝位。是时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

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刘宾客外集》卷九《子刘子自传》）说白了，就是暗示唐宪宗之即位与宦官的拥立有直接关系。

于是，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李纯被反对革新的宦官集团拉拢过去了，他不仅没有成为革新派的支持者，反而成为革新派的对立面，这对革新派是个致命的打击。

李纯被册立为太子之后，王叔文面有忧色，默默吟诵杜甫《蜀相》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可见他当时的心情多么沉重。但是革新派依然希望李纯能够与革新派站在一起。他们任命革新派中重要的理论家陆质为太子侍读，希望通过他影响太子的思想。没想到，李纯对陆质讲的那一套根本不感兴趣，而且非常讨厌陆质谈论当朝政治，训斥他说：“陛下令先生为寡人讲经义耳，何为预他事！”（《资治通鉴》卷二三六）你就老老实实地讲经义之书，不要胡乱扯其他事情！可见，李纯对王叔文等革新派人物已经是非常反感了，这种反感当然不仅是由于人品道德或者是性格不合使然，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对立。显然，在立太子的过程中，李纯对于王叔文等人所表现出来的对立情绪是非常了解的。

那么，在立太子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柳宗元起到了什么作用？他有一篇名为《六逆论》的文章，这样写道：

《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夫所谓“贱妨贵”者，盖斥言择嗣之道，子以母贵者也。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



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

大意是：《春秋左氏》记载了“六逆”的说法：低贱的妨害高贵的，年纪小的凌犯年纪大的，关系远的离间关系亲的，新提拔的离间资历老的，地位低的凌驾地位高的，邪恶的破坏正义的，这是国家混乱的本源。但我认为不尽然。所谓出身低贱的妨害出身高贵的就会发生祸乱，这应该指的是继承国君的原则。我想，如果一个人出身高贵却非常愚蠢，一个人地位低贱却聪明贤能，如果后者取代前者，这就算作是低贱的妨害了高贵的，那么，这种“妨害”是符合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的。我们坚决不能盲从“贱妨贵”这种说法。

我们姑且不论这篇文章是否是针对当时立太子的斗争而写的，但他这种选择皇嗣不论贵贱嫡庶的观点显然对李纯相当不利。难怪后来李巽说：“当先朝之日，上体不平，奸臣王叔文擅权作朋，将害于国。”（《唐会要》卷八十《朝臣复谥》）李肇也说：“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唐国史补》卷中）

综合这些说法，也许，当时王叔文等革新派有另立皇嗣的图谋。而反对派的动作更快，也更切合实际。王叔文等人所依靠的宦官是李忠言，而当时的太子李纯刚明果断，他被另一股宦官势力所拥戴，所以这样一来，本来是革新派与反革新派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现在却变成了立什么人为太子，是否同意立李纯为太子的问题。其实，李纯后来做皇帝之后，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与王叔文等人的革新措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在很多做法上更为成熟、老到而已。但不管怎样，在李纯

看来,王叔文等人首先是他在政治上的死对头,至于政治见解的相近、政治举措的类似,反而退居其次,成为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

第四,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执政方式不正常,工作作风不良。这一派的人物多是出身微贱的新进官僚,“素贫贱,暴起领事”(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本来都是很普通的年轻人,忽然成为了朝政改革的领袖人物,这让大多数有年资有阅历的老官僚们很不舒服。因为在王叔文开始执政的时候,当朝的宰相们大都是比较有声望却不免因循守旧的官僚,王叔文等人要积极推进改革,就不可能完全遵循正常的行政程序来管理朝政。再说了,官僚阶层守旧因循的政风本来就是他们革新的重要内容。因此,当时革新派的执政过程基本绕过了宰相这个正常的行政中枢。王叔文们为了更有效地贯彻革新举措,不得不利用宦官、宠妃这样特殊、私密的内宫关系展开行政程序。具体而言,当时革新派的行政运行程序是这样的:

唐顺宗因中风言行困难,只能卧床,无法正常视事,外朝官又不能进入皇帝内宫,所以顺宗的旨意只能通过身边的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宦官李忠言,李忠言再将旨意传给待诏在翰林学士院的王叔文,王叔文根据具体情况决策相关事宜,然后将命令递交给政事堂的宰相韦执谊执行。韦执谊是革新派安插在中书政事堂的唯一一位宰相。而柳宗元、刘禹锡当时则分别官居礼部员外郎、屯田员外郎等更具体的职务,负责具体执行各项措施。

这种行政运行程序显然是不正常的,这也决定了革新派从一开始地位就不稳固。他们在朝廷内部没有深厚的根基,仅仅依靠一个病弱不能



言行的皇帝，以及皇帝身边的宠妃与宦官，再加上一些年轻的新进之士，迅速却不免简单化地推进工作。这也就导致他们的工作作风会出现一些问题，往往形成集团内的一个小圈子，没有积极地拓展交游圈子，无形中，将革新集团与更广泛的官僚集团隔离开来，造成了不良的舆论环境。如：

叔文虽判两使，不以簿书为意，日夜与其党屏人窃语，人莫测其所为。（《资治通鉴》卷二三六）

大意是：王叔文虽然担任了度支与盐铁转运副使两项重要职务，但他并不把日常政务放在心上，而是屏退外人，不分白天黑夜地与同党密谋朝政，他究竟在干什么，外人都不得而知。

叔文……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以进，日与游处，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资治通鉴》卷二三六）

大意是：王叔文暗中结交时任翰林学士的韦执谊，以及当时一些有名声并希望能够获得快速提升的官员如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彼此约定为生死相托的朋友。他们这些人行踪诡秘，外人难以接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外党则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泯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与往还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数人。其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过一二日，辄已得之。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饼肆、酒垆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伾尤闾茸，专以纳贿为事，作大匱贮金帛，夫妇寝其上。（《资治通鉴》卷二三六）

大意是：革新派在外的同党有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他们负责收集信息情报，探听舆论动向。他们这些人夜以继日地在一起筹划计议，彼此应和，天天行色匆匆，狂傲自任，还互相吹捧，你说我是伊尹，我说你是周公，他说咱们是管仲、是诸葛亮，自得到了极点，认为天下老子第一。在他们的操纵下，对官员的提升贬抑都很随意，往往发生在顷刻之间，他们想做的事情，都不受法律规矩的约束。士大夫们对他们心怀畏惧，却又敢怒而不敢言。只要是跟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就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提拔升官，以至于一天以内便提拔好几个人。他们的同党中，只要有人说“某人可以担任某官”，过不了一两天，这个人便会得到这个职务。因此王叔文及其同党的门前，常常是昼夜车马往来，门庭若市。等候拜见王叔文的客人，不得不在他们所在街坊的饭店过夜，饭店收取每人一千钱，方肯收留。其中王伾的行为尤其猥琐，他喜欢收受人家的贿赂，他还专门做了一个大柜子来装金银财宝，晚上，他们夫妻二人就睡在这大柜子上。